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的 国民体系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邱伟立◎译



史上最受欢迎的经济学经典

★★★★
超值
白金版

国家学派经济学说的代表性著作
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013065482

F091.342
01(T)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晏智杰◎主编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的 国民体系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邱伟立◎译



北航

C1672519

F091.342
01(T)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 李斯特(List, F.) 著; 邱伟立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超值白金版)

ISBN 978 - 7 - 5080 - 7652-2

I. ①政… II. ①李… ②邱… III. ①历史学派—研究
IV. ①F091.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3623 号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作 者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译 者 邱伟立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 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

2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英译者序

大约五年前，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一系列著作在德国发表并大量发行的时候，《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对这些著作在拥护保护性商业政策的那个国家产生的有力影响进行了评论。

正是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实际影响得到了证实，首先吸引了我对李斯特著作的注意。我在认真阅读了这些著作之后，便产生了翻译这部论著的想法，目的是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自行判断作者论断的正确性和论证的合理性。

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历史、理论、学派和国民经济政治学。它是在1844年前完成的，尤其是第四部分描述的大部分政治情形与商业政策现在已不复存在，记住这点至关重要。当时大不列颠《谷物法》、《航海法》以及普遍的保护主义关税制度仍未废除；德国的制造工业尚处于初始阶段，德国各邦相对适度的关税制度仍然允许英国为它们提供它们需要的绝大部分制成品。

因此，乍一看，把一部与四十年前事态有关的论著摆放在当今的读者面前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李斯特阐述的这些原理的主要特征既适合一个时期，同时又适合另一个时期；人们将发现，它们拥有两个特别有力的主张可供参考。

首先，有个很好的理由令人相信，它们直接导致了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国家——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的产生；其次，它们为那些保护主义者的教义提供了明确的科学基础，虽然这些教义只被我们讲英语的殖民地执行，被这个国家不少务实的人和一些商业经济学家所坚持，但时至今日，英国的学者只是部分地和不完整地阐述过这些教义。

人们将看到，李斯特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自

2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由进口，同时给予同外国竞争的本国制造工业有效的而不是过度的保护（通过关税手段）。根据他的观点，对本国农业生产和原料生产给予行之有效的支持，是维护受到保护的制造工业在本国繁荣和昌盛的前提条件。因此，他所提倡的制度，一方面既有别于英国单方实行的自由贸易中的无条件自由进口的制度，另一方面又不同于俾斯麦首相现在明显赞同的对食品、原材料以及制成品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制度。

事实上，李斯特在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英国的和外国的）所倡导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之间划定了明晰的界限，他把“国家”政策当作“世界贸易”政策的对立面而极力加以辩护，尽管自从英国采取“世界贸易”政策以来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国家实际上接受这一政策。

在同他所认为的世界主义理论的有害谬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李斯特偶尔严厉地抨击当时英国的商业优势。但他不但不是英国的敌人，而且是一个英国制度的忠实崇拜者和这个国家同德国联盟的热烈拥护者。“英国和德国，”他写道：“在东部地区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通过阴谋诡计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它取得的商业和经济的进步，英国为了次要的贸易利益正在牺牲最高的政治目标，而且将来也必定对它这种目光短浅的店主政策追悔莫及。”他还给英国和普鲁士政府写了一篇简短犀利的文章——《论大不列颠和德国联盟的价值及其必要性》。

在翻译这部论著的过程中，我的目的是尽量翔实地再现原著。我既没有试图节略我的作者的繁琐之处，也没有改变他的风格，译文中用斜体或大写字母强调的段落，原文同样如此。那些准备接受李斯特部分或全部论断的人，在我们的国家可能很多，而我则更喜欢用李斯特自己的方式对其理论和论证进行论述，不加篡改和修饰；那些反对他的教义的人，或许仍然对这位德国关税同盟的知识的创立者和普及者在向世界表达他的观点时所运用的确切形式感兴趣。

作者传略^①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1789年8月6日生于符腾堡的鲁特林根市，其父是制革匠，同时担任多个公职，虽不富有但深受尊重。弗里德里希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父亲职业的反感，决心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他先后在布劳伯恩、尤尔姆和图宾根等地的书记员办公室供职。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政府组织的几个考试，尔后进入符腾堡政府市民服务部工作。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到1816年就升任到了大臣副秘书长长的职位。冯·万根黑姆大臣好像一开始就很欣赏他的才能，热诚欢迎这位多才的助手帮助他推广他的改革计划。

计划之一是在图宾根大学设立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这一举措促使李斯特出版了一本充满智慧且内容丰富的小册子，毫无顾忌地对符腾堡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一些与新学科有关的、极具培育重要性的知识分支几乎全被忽略了。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一篇文章，倒不如说是一个宣言，也可以被看作是李斯特首次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公开宣战的宣言，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冯·万根黑姆非常欣赏这本小册子，遂任命作者为该大学应用管理学教授，并鼓励他坚持州政府改革、地方代议制政府和新闻自由的主张。

令人不快的是，大臣对他所付出的努力的赞许，非但没有给李斯特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是致命的。那个时代不适宜提出改革计划，

^① 节选自斯图尔特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记：《祖国的先锋和献身者》（1877年）。

4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那些达官贵族和官僚不能正确地分改革与革命，而改革计划也引起了国王的警觉，大臣被迫辞职了。

然而，出版这本小册子绝不是李斯特唯一一次攻击强势的官僚保守主义体制。在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的1815年，德国外交家们似乎赞许对民族工业利益置之不理。欧洲大陆长期采取的封锁政策，是一项有利于德国国内贸易的强有力保护制度，对德国的一些小的省区而言尤其如此。但是，随着封锁的解除，当德国口岸以低关税向外国制造商开放的时候，德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贸易却仍然受到沿各省区边境设立的境内海关的严格限制。这一状况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一个争取废除境内关税的联合会成立了。李斯特接受了该联合会主席一职，但他因此即遭到了政府的谴责并被免去了公职。鲁特林根市的追随他的市民们对他充满信心，又推选他为符腾堡的国家立法大会代表，但是，由于他对那些当权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这次选举因遭到大臣的否决而被取消了。

可是他毫不气馁，李斯特不遗余力，极力鼓动取消这些境内关税，鼓动成立德国各省区的商业联盟，从中他预见，德国政治联盟最终也将效仿商业联盟。他不但在媒体上以信函、文章和小册子的形式大肆提倡这些做法，而且在那个旅行既困难又昂贵的时代，为使主要政客们和商界领袖们知道他的观点，他到处旅行，去了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其他德国省府。然而，他的行为和观点在当时并未产生任何实效。他发现，那些商会的头头们一如既往地胆小怕事，而大臣们则一如既往地嫉妒任何“未经授权”的出于政治目的的鼓动。

此后不久的1822年，他再次当选为符腾堡立法大会的家乡代表。但是，一场拥护商业联盟和其他改革需要并主要由他参与组织的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遭到了国王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李斯特不但被排斥在了大会之外，而且还被定罪被判入狱十个月，在一个要塞服苦役并支付全部诉讼费。

为逃避严厉判决的执行，他逃到了斯特拉斯堡。但是，他刚停留不久，当局就应符腾堡政府的要求命令他离开那座城市。他从斯

特拉斯堡去了巴登，但是他再次受到了同样的侮辱。从巴登他又去了巴黎，在那里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拉法耶特将军还邀请他到美国去访问。但是，他非但没有马上接受邀请，而且还出于对祖国的挚爱，反而又回到了符腾堡并请求国王宽恕。他的请求未被理睬。他再次被捕并囚禁在了阿塞尔堡的国家要塞。他被监禁数月后获释，条件是他必须声明放弃符腾堡国籍，立即离开这个国家。于是他又去了斯特拉斯堡，同时再次受到了对他充满仇恨、志在复仇的符腾堡国王的跟踪。应国王的要求，法国政府也不许他继续在法国领土上滞留。他决定彻底离开欧洲一段时间，到美国避难。在美国他再次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通过将军的介绍，他同好多人士建立了友谊，如杰克逊总统、亨利·克莱、詹姆斯·麦迪逊、爱德华·列文斯通等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家。

为了维持生计，他购买并开发了一小片土地，但他的尝试未获成功。随后，他开办了德语报纸《阿德勒》。当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税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于是，李斯特的朋友们建议他在自办报纸上就这一议题撰写系列通俗文章。他就此先后发表了十二封致时任宾夕法尼亚“制造业促进联合会”的会长因格索尔先生的信。在这些信中，他全力攻击亚当·斯密提倡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强烈要求采取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与此相反的政策，并用从美国现行经济条件中得出的例证说明他这一道理所蕴含的真谛。

该联合会随后以“新政治经济学体系概要”为题再次出版了这些信（费城，1827年）。联合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断言李斯特通过论证已经奠定了一个新颖合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给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该联合会要求李斯特做两项文字工作：一是对其理论进行科学阐述；二是撰写通俗论文供公立学校使用。联合会承诺每样订阅五十册，并建议其他州的立法机构也这样做。

《阿德勒》报取得的成功，连同他有幸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一个具有开采价值的新煤矿，使李斯特达到了富足的程度。但是，尽管他在本国曾经历过国王和统治阶级的忘恩负义，但他对祖国仍然魂牵梦绕。从1828年到1829年，他在许多论文和文章中多次强调建立贯穿德国全境的国家铁路系统。推广他这一新设想的渴望增强了他

重访欧洲的愿望。

因此，熟悉李斯特观点的杰克逊总统派他出使巴黎，希望借此机会促进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遂于1830年任命他为美国驻汉堡领事。但是，那些六年前曾以判刑和流放对待李斯特政治改革建议的陈旧的风气并未死亡。在那些一味顺从的德国官方媒体的眼中，李斯特仍然是一个“革命英雄”，美国公使冯·伯尔仁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汉堡上院拒绝批准这一任命，因为他的祖国符腾堡禁止他回去访问，于是他又回到了巴黎。在巴黎，美国代表里沃斯把他介绍给了几位有影响的朋友。那时比利时刚刚获得独立，一个实现其计划的更加有利的前景似乎展现在了他的眼前：建立德国国家铁路系统，以及通过比利时增强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商业交往。他后来又回到了美国作短暂逗留，不久即以美国驻莱比锡领事的身份回到了欧洲，这个身份可以促使萨克森政府和人民接受其铁路系统的主张，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满意地看到，为在德国修建几条铁路，数家有实力的公司得以成立。在莱比锡期间，他做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在1834年出版了《国家大百科全书》；另一项是在1835年办成了《铁路杂志》。它们对德国舆论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哈—卡铁路（哈尔—卡塞尔，Halle to Cassel）的勘测图初稿中，设计线路避开了几个城镇：诺姆堡（Naumburg）、威玛尔（Weimar）、高萨（Gotha）、额尔福特（Erfurt）、爱森纳希（Eisenach）。李斯特指出了这一设计在战略和商业两个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并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德国一些小法院提出抗议，成功地保证了三个城镇受益于铁路交通。为感谢他在这件事情上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高萨公爵向李斯特表示谢意，并授予了他耶拿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高度称赞他彻底地把三个属地威玛尔、高萨和梅纽根（Meiningen）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同时奖励他一份丰厚的奖品：一百个金路易。对他的评价是：“所以好像每个被拯救的地区估计它们的获救正好值三十三点三三个金路易。”

1837年，他在去巴黎的途中顺访了比利时。在那里，他受到了盛情款待并找到了在阿斯堡一起蹲过监狱的老相识科尔布（Kolb）博士。通过科尔布博士的影响并在他人的劝说下，李斯特永久接受

了著名杂志《报告汇总》的一项文字工作，该杂志马上腾出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影响德国实际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关税和《商业法》，以及德国与奥地利之间商业关系的话题。李斯特充分利用了这个绝妙的机会，通过撰写一系列文章大力传播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主要针对德国和比利时同美国之间的商贸关系。他还于1839年在巴黎的《宪法》杂志专栏中发表了他的观点。

整个欧洲掀起的呼吁取消英国《谷物法》的鼓动运动，同样给他提供了阐述支持国家保护政策的观点并建议德国予以采纳的机会。

在强调一定要待英国的制造业能力得以完全建立之后方能限制谷物进口这一观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时，李斯特主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的成功建立和维持只有靠原材料的自由进口和合理保护本国工业才能抵御外国产品的进口。

《谷物法》取消后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人们预料这一措施将导致德国废除对外国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制度。但是，按照李斯特的说法，只有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它才能在其他方面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经受住与外国制造业进行的竞争，它才能安全放弃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并开始实行全面自由贸易政策。这其实是李斯特理论的中心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提出的世界主义理论；而在政治和国家政策方面，他则反对他们提出的全球自由贸易理论。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坚持了这些观点，尤其是在“论自由贸易与保护”和“论民族制造业的本质与价值”两篇文章中。在他这些文章发表之前，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德国公开讨论过，因此理所当然地，首先唤起公众对这些问题产生广泛兴趣的功劳应归于他。

离开莱比锡后，奥格斯堡成了李斯特及其家人的永久居住地。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一部分，并于1841年发表。第二部分计划包括“未来政策”，第三部分包括“政治制度对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影响”。就在李斯特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普鲁士代表德国关税同盟于1841年3月2日同英国订立了一个商贸条约。李斯特强烈反对该条约，他对条约的谴责不但激起了官方报纸的愤怒，辱骂他是“德国走狗”，而且还使他再次陷于了同

“当局”的冲突之中。在1842年7月13日致阿伯尔登阁下的信中，英国大使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对李斯特的著作表示不满，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受雇于德国制造商的才华出众的作者”。因为英国反《谷物法》联盟曾付钱给演讲者和鼓动者，因为英国政府曾付钱给鲍林博士（Dr. Bowring）让他在德国、法国和瑞士进行游说鼓动，鼓励那里的人们支持英国的商贸利益，因此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这种关于李斯特也是一个受雇代言人的假设就不足为怪了，但却是无中生有和毫无根据的。不管李斯特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价值有多大，它们至少都是无偿的。

就像人们可能早已预料的那样，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出版即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是，对这本书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以至于在短短数月内再版三次，并被译成了法文、匈牙利文等在国外出版。对这本书的主要异议集中在它提出的制度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而只符合德国的利益上。在这一点上，李斯特从未试图隐瞒。他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将德国从英国强大的制造业优势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就连最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的建议是最切实可行的。但是，李斯特从来不提倡禁止政策。他宣称：“任何一个决定放弃进口绝对自由政策的国家必须从适当征收关税开始，直至最后实行它曾经决定的保护制度为止。”他还说，“任何完全排斥外国竞争的关税制度都是有害的”，但是“只能允许外国制造业的生产提供部分国内的消费品”。“在本国保持国家工业的基础，必须永远是国家政策坚定不移的目标”。

1844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四部分（政治学）。在这一部分中，在诠释了坎宁（Canning）、哈斯肯森（Huskisson）、拉保施赫（Labouchere）和朴特雷特·汤姆森（Poutlet Thompson）等人提出的谈判和经济措施以及分析了他称之为“狡猾恶意的英国商贸政策”之后，李斯特主张，在德国建立非常高效的河流、运河、铁路运输系统，实行统一管理，成立德国舰队，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德国国旗，在海外设立殖民地，国家对移民实行监督，在海外设立高效的领事馆，建立德国蒸汽轮船定期航线，同美国、荷兰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订立有利的商贸条约。

英国媒体在批判其著作时使用的污蔑性的咒骂，使李斯特的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这次“正中要害”，因而扩大了其著作的影响。

1843年，除了继续从事原来的一些文字工作之外，他又接受了《海关报告》的编辑工作，并继续在《报告汇总》和其他报纸上发表关于经济和商贸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关于德国铁路系统的进展情况。他造访了匈牙利，受到了热烈欢迎。考苏特公开称他是“一个为各国真正国民经济利益而精心指导过这些国家的人”。他受到了波希米亚纺织联合会、莱比锡制造商大会、莱茵制铁业制造商联合会等公共团体的奖励。在遭受他人指责的痛苦中，他也遇到了令他兴奋的事情，亲眼目睹了德国关税同盟于1844年9月1日同比利时订立了一个条约，他曾长期真诚地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亲自访问布鲁塞尔。他说，通过这个条约，“使得关税同盟能够拥有足够的便利条件从事外贸，如同把荷兰和德国北部的全部港口都纳入了其管辖范围之内”。最后，在拜见符腾堡国王时，他得到了对他以前遭到的不公待遇的迟来的承认：“我尊敬的李斯特先生，我对你并不怀有任何恶意，二十四年前我们没有学会像今天这样相互理解，多么遗憾啊！”

这时，无休止夜以继日的劳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时常剧烈头痛，苦不堪言，体质越来越虚弱，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英国《谷物法》即将废除，李斯特担心这一措施恐怕会使英国进一步损害德国的制造业。他不顾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急忙奔往伦敦，希望实地了解清楚当地舆论和这一即将发生的变化对德国工业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受到了一些曾经反对过其政策的人的盛情接待，其中就有理查德·戈伯登。后者开玩笑地问他：“你竟然过来改变自己？”然而，李斯特的这次访问却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英国确保自己在整个大陆制造业优势的决心越加迫切，德国就越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己免受冲击。

从英国回来后，尽管得到了妻子和家人的精心照顾，但他的身体还是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异常症状。他的身体已经垮掉，怀着恢复健康的一线希望，他去了一趟蒂罗尔，但为时已晚。他在库夫

斯坦卧床数日后，独自一人于1846年11月30日离开了住处。他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他写给老朋友科尔布博士的一封信。人们展开了搜寻，结果在刚下过的雪层下发现了他的遗体。种种迹象表明，毫无疑问，因一时心理失衡，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库夫斯坦公墓中的一座墓碑成了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德国和海外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去世深表哀痛。为表彰他为促进德国统一、增强德国实力和福祉所做的无私的和不懈的努力，人们进行了募捐，给失去了亲人的家人送去了丰富的抚恤金。巴伐利亚路易斯国王和曾经轻视并虐待了自己的才华横溢的爱国之子的祖国符腾堡摄政王属于第一批认捐者。他曾经的许多政治对头也都加入了纪念他的活动行列，甚至提出要求“为这个高尚的爱国者立一尊纪念像是德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呼吁得到了响应，人们在他的故乡鲁特林根为他立了一尊雕像。

李斯特提出的商贸政策大部分被他的祖国所采纳了。从此以后，国内关税消失了，在德国商业联盟的领导下，德国的制造业和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建立殖民地，德意志帝国的国旗悬挂在了德国的航船上，德意志帝国统一了德国人民。尽管这些伟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后人们的不断努力，但是一些功劳应该归功于一个长期以来首先为之辩护的人，他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财富直至生命。

李斯特的才华表现在，他是一个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一个才华出众的勤奋笔耕的作家，一个态度认真不知疲倦的政治鼓动者。毫无疑问，他的整个政治鼓动生涯更是出于本能而非为国家服务。他的事业是政治先锋出力不讨好的任务——一个不被允许目睹自己预言得以实现的倡导者。他预言自己的国家未来会更加美好，但那些最初本该帮助他使预言早日实现的人却对这个预言表示怀疑和不满。

著者自序节录

从我开始对盛行一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努力探寻（在我看来）其错误和根本原因以来，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我的本职（教授）给予了我从事这项任务的动机，而我命中注定要面对的反意见则强烈促使我把这项任务进行到底。

与我生活在同时代的德国人记得，德国人的幸福水平不断下降，1818年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通过学习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作好了充分准备。如他人一样，我尽量使自己全面充分地了解他人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以及之前已有的文献。但是，我不满足于按这门科学的现有形式教育年轻人；我希望教育他们哪种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德国人的幸福、文化和力量。流行理论反复灌输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我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以及三个王国统一在大不列颠政府名下时产生的结果时，在我看来该原则既符合常识又已被经验所证实。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产生的绝妙效果以及取消该制度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最近发生的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在我看来，这些结果同我以往的经验好像直接矛盾。在试图搞清这个矛盾发生的基础是什么的过程中，**理论确实正确，但是只有当各国都像各省一样共同遵循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确实正确。**这个观点打动了，它促使我考虑国家的本质。我觉察到，流行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而只是笼统地考虑问题，一方面考虑全人类，或另一方面考虑单一国家。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高度文明的国家，要在自由竞争下双方都获得利益，只有当两国的工业发展处于大体同等水平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方面还落后于其他国家，那么，即使它已经拥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但也必须首先加强自身

的力量，才能适合与比它先进的国家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通过对外国人实行统一的商贸政策，才能经过努力达到其他国家凭借商贸政策而实现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水平。

1819年，整个德国涌现出了许多有关新政治制度的策略和规划。统治者和臣民、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员和学者全都参与其中。德国就像一个遭受过战争毁坏的家园，以前的家庭主人回来后准备重新进行修整。有些人想修旧如旧，小到每个细节；而有些人则想重新规划，全部使用现代家具；还有一些人则兼顾常识与经验，希望走中间路线，这样可能使对过去的要求和现在的需要和谐一致。观点上的矛盾和冲突处处可见，到处都是旨在促进爱国目标的团体。国家的《宪法》本身就是新颁布和仓促拟就的，多数开明的有思想的外交家都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胚胎，期望从中培育出更加完美的未来。《宪法》的一个条款（第十九条）特意建立国家商贸制度敞开了一扇门。在我看来，该条款奠定了我国工商业今后赖以繁荣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成立德国商人和制造商联盟的想法，旨在取消德国国内关税，在全国采取统一的商贸政策。这个联盟最初怎样生根发芽，以及如何引导高尚和开明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以及后来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都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德国商业联盟的顾问，我处境艰难，举步维艰。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雇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们都受过世界主义学派的教育，他们都认为任何一种保护性税制在理论上都令人生厌。他们得到了英国利益以及那些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的援助。众所周知，英国政府用“秘密服务金”这个手段有力地控制着国外舆论，只要有利于其商贸利益，英国都愿花血本，从不吝啬。由来自汉堡和不来梅、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和知名学者组成的新闻大军出现在了该领域，他们谴责德国制造商的统一保护性税制为“不合理的愿望”，对其顾问恶语相加，肆意漫骂，恶意诋毁，例如，指责他对科学权威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一无所知，或者指责他智力不全无法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理论和德国学者们的见解站在他们一边这一事实，使这些